



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
重庆三峡学院科研文库

SHITAN QIAORAN JUEQI DE SHANXIA SHIQUN

诗坛：悄然崛起的 三峡诗群

何休 著

长江三峡书系





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
重庆三峡学院科研文库

SHITAN QIAORAN JUEQI DE SHANXIA SHIQUN

诗坛：悄然崛起的 三峡诗群

X
I 707.22
H218

赠书



何休 著

长江三峡书系



2002458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诗坛:悄然崛起的三峡诗群/何休著.

—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9

ISBN 7-5621-2953-3

I. 诗... II. 何... III. 诗歌—文学研究

—中国—当代 IV.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82896 号

诗坛:悄然崛起的三峡诗群

何 休

责任编辑:张渝佳

封面国画:黄 云

封面设计:王 煤

出版、发行: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重庆·北碚 邮编:400715

印 刷:西南师范大学教材印刷厂

开 本:850mm×1168mm 1/32

印 张:9.625

字 数:240 千

版 次:2003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200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0001~1000

书 号:ISBN 7-5621-2953-3/G·1807

定 价:22.00 元

序 言

新时期诗歌的发展与地域诗歌的民族性和世界意义

大略认识事物,总需要拉开一个距离,方能看得周全透彻,这是因为有比较才有鉴别的缘故。因此,对正在发展中的文学现象做出评价,实在是一件困难的事。所以多数有眼光的文学批评研究家,是决不做这种劳而无功的蠢事的。

但也有少数例外。远的例子,便是俄国的别林斯基,他甚至差不多给每年新出现的俄国文学都要写一篇评论;那些评论,撇开其对当时的文学创作所起的影响作用不说,100多年过去了,现在看起来也并不觉得怎样肤浅。近的呢,我们也可以举出谢冕先生当年的勇气作为例子,他能及时地推出舒婷、北岛等一批当时压根儿不被承认的新潮诗人,现在看来,似乎也没有什么大错。这都很鼓舞人心。我自然不能和这两位先生的学识和勇气相比,他们是确确实实的文学理论批评家,负有引导文学发展的责任;而我只是从自己的性情出发,更关注当前的文学现象罢了,有了感想,就想发表,无须和那样有影响的文学理论批评家相比来约束自己,使自己手足无措。

我对悄然崛起的中国西部诗群和三峡诗群的关注,已历十余年。这十余年间,中国西部诗群和三峡诗群的发展演变,既让我兴奋,又令我感慨不已。这期间,我除了教学工作外,自然还做了其



他许多事情，但对于中国西部诗群和三峡诗群的关注与研究，却一直没有停止；因为我深深地感觉到，它们的出现、存在和发展，对于今天的中国诗坛，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到今天，《诗坛：悄然崛起的三峡诗群》和《从西部诗坛刮起的绿色风暴——中国西部诗群大观》两部书稿，终于完成了。我的工作算是告了一个段落，自然有一种如释重负的喜悦。

这长达十余年，对发展中的地域诗歌群体的关注和研究，有什么意义呢？我想，我应该写几句序言，说说地域诗歌对当今诗坛和对一个民族和世界的意义。

诗歌现象亦如人类的其他精神现象一样，历来都是十分复杂而丰富的，中国进入全面的改革开放新时期以后，情形更是如此。这里面既包含现实的因素，历史的因素，也包含外来的因素即世界性的因素，并且每个方面的内涵，都不是单一的，都包含着政治的、经济的、社会心理的、道德伦理的因素，以及地域文化、民族文化的因素在内。

回顾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的当代中国诗歌发展史，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它所经历的三个阶段：

新时期诗歌的第一个阶段是从1978年到1984年，即新时期初期。这个阶段，以国家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拨乱反正，全面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大政方针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政治背景，实现了继“五四”之后的又一次思想解放。作为社会心理的反映，诗歌创作又一次充当了新的文学潮流的先锋，破除对“神”的迷信的“人的觉醒”和沉痛的“历史反思”自然成为诗歌创作的中心内容，引起人们强烈地震动。而从诗歌的创作方法和审美特征讲，既有北岛、舒婷、梁小斌、顾城、江河等撼人心魄的所谓“朦胧诗”，显示着全新的人格精神和美学品位而被称作与现代派诗歌有某些相通之处的“新诗潮”；又有雷抒雁（《小草在歌唱》）、叶文福（《将军，你不能这样做》）、杨牧（《我是青年》）、熊召政（《瘠地上的樱桃》）、



张新泉(《岁月的河流》)、傅天琳(《绿色的音符》)等关注现实、干预生活、直抒胸臆的诗歌作品;还有老一代诗人艾青(《鱼化石》)、曾卓(《悬岩边的树》)、杜运燮(《秋》)、公刘(《仙人掌》)、邵燕祥(《愤怒的蟋蟀》)、牛汉(《温泉集》)、蔡其矫(《生活的歌集》)等有着深刻的历史内涵的“归来之歌”——其中曾卓的《悬岩边的树》和杜运燮的《秋》等意象含蓄的作品,还被当做“朦胧诗”而被人乱批一气。这些有着不同诗歌精神、审美特征和艺术风格的诗人诗作,都能以各自不同的个人经历、人生体验和抒情方式,表现着一种共同而强烈的历史批判意识和对社会进步与人的命运的关心,从而使中国文学中久已遗忘的人道主义精神得以复兴,人的尊严与人格精神得以表现,“神”的迷信得以破除,人的思想的禁锢得以解除,大大促进了自“五四”以来一次新的思想解放运动,将文学对人的觉醒的激发推向了极致。这是 20 世纪以来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空前未有的新景观,是应当给予充分肯定的。

这一阶段的新时期诗歌与新时期小说、戏剧、散文等别的文学样式一起,留给当世和后人的,是一笔非常厚重的文学遗产,值得我们和后人去认真地体味、学习和研究,吸取其思想、艺术的营养,也体悟文学历史发展中所给予我们的种种启示。

新时期诗歌的第二阶段为 80 年代中后期(1985~1989)。在这一阶段,国家的政治生活着重转向推进城市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市场经济开始运作,并逐渐形成一股新的浪潮,冲击着人们的思想观念,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在这种新形势下,从传统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人际关系中生活过来的绝大多数的人们,其固有观念与思维定势一时还难以适应这种变化而迷惑不解。加之政治体制的改革滞后、官僚机构的凝固僵化、监督机制的严重缺乏,导致“权钱交易”、“官倒”、“腐败”等丑恶现象的滋生,更使一些人困惑迷惘、狂躁不安以至愤怒不已。与此同时,随开放之风而来的西方现代文学观念与思潮流派的大量涌入,引起诗坛文



苑的种种骚动。上述社会心态与文学思潮反映到文学理论批评上，则是“文学主体性”的高扬和文学批评观念与批评方法的多元化格局的确立。反映在文学创作上，一个方面便是“第三代诗人”喧嚣一时的所谓“中国现代主义诗潮”（或称“后新诗潮”）的掀起，以及“先锋派小说（戏剧）作家”对“后现代主义”艺术精神与表达方式的刻意模仿——尤其是对形式主义“文体写作”的热心追求，这种追求因脱离了广大读者的胃口而被称为“贵族化倾向”，从而造成对传统现实主义文学精神的巨大冲击；另一方面，便是作为对纯文学“贵族化倾向”的反拨，出现了面向现实的纪实文学（报告文学）的大潮，以及面向大众文化层的消费性通俗文学的大潮——这种通俗文学在诗歌创作中的表现就是汪国真的“纯情诗”一类东西，受到中学生读者的普遍欢迎。总之，这一阶段在总体上，纯文学（无论诗与小说）的历史意识和社会意识是逐渐地趋于淡薄，作家的使命感即社会责任感和人道主义精神也随之低落，而趋于平庸；占领着80%以上刊物版面的文学主潮，明显地转向对审美形式、艺术技巧的片面追求，以及平庸主义、世俗主义情绪的无遮拦地宣泄。在诗歌创作上是如此，在小说和其他文体形式的创作上也是如此。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就在这样的诗坛文苑背景下，却仍有一部分历史感和使命感难以泯灭的中青年诗人作家，依然执著于现实主义文学精神和纯正的理想主义不动摇。他们从反思历史、关注现实的“人的文学”的创作，进而深入到追寻民族文化心理和地域文化之“根”的“寻根文学”、“文化诗”、“文化小说”的创作，并以开放的精神吸收着外域现代派文学的某些表现手法，从而形成一种开放的现实主义艺术精神，进一步丰富和提高了诗与小说的表现力。以杨牧、周涛、章德益、王辽生、李瑜、昌耀、林染、何来、李云鹏、姚学礼、高深、萧川、刘国尧、梅绍静、叶延滨、闻频、渭水、马丽华、魏志远、张新泉、鄯家发、傅天琳等诗人为代表的“西部诗群”



在 80 年代中期的崛起,就是这一文学现象在诗歌领域的突出表现。

经历了政治与经济、新与旧的矛盾之集中展示的 80 年代中后期,诗歌吸取其教训之后进入了相对稳定的 90 年代——新时期发展的第三阶段。在席卷一切的“商品大潮”的背景下,曾经喧嚣一时的“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和形式主义的“先锋派小说”试验已告消歇,起而代之以,则是现实主义文学精神的深化——在各个领域的文学创作中,生存意识的凸现。对于现实的生存环境和人的生存状态的关注,成了 90 年代众多诗人、作家共同关心的“主题”!但作者们在表现方法上,却尽量避免主观激情的渗入,从而有别于 80 年代初期的“朦胧诗”、“归来之歌”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新问题小说”的创作。这样便出现了诗坛、文苑的相对冷清;出现了诗人、作家的分化;出现了创作中现实主义向着生存意识与生命体验的潜沉。在诗歌领域里,出现了对生存状态、生命体验和对社会风情、文化心理的抒写,出现了所谓“女性诗”和“个人化创作倾向”。在小说领域里,出现了“新写实小说”、“新女性小说”、“新历史小说”和回归民间的所谓“新现实主义小说”(亦称“现实主义冲击波”),以及为商品大潮推波助澜的“商战文学”和完全为了市场消费而运作的商业化、平庸化写作。在创作方法上,90 年代的中国文学显示着以开放兼容的现实主义为主潮的、多元大融合的文学新格局:曾经聒噪一时的现代主义已消隐潜沉下去;浪漫主义却在生命体验的抒写中时隐时现,获得了相当的势力;现实主义又重新受到了人们的重视,并更新了观念而得以复兴和发展,继续以开放兼容的姿态,吸取着新的艺术手法,从而确立了它在 90 年代文学的多元化格局中的主潮地位。其文学精神和创作方法的这种发展趋势,在当今中国和当今世界的大背景下,可说是必然的,既有其“面向世界”而与之沟通的一面,又有其土生土长的“中国特色”(即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的一面。因而在其“与世界





对话”的同时，又明显地带着“中国话语”的特征和调子。90年代文学的总的成就该如何估价？由于作者众多，作品数量巨大，出版发行又带着特有的商业性质，创作资料的完整收集和深入研究都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事情，所以恐怕一时还难以论断。但文学的对生存状态和生命本体的关注，却无疑是90年代文学的中心主题。文学创作的多元化，及其从多元对立走向多元融合，却是可以肯定的趋势。没有特别引人注目的巨匠和巨著产生，也是可以肯定的事实。

就诗歌而言，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在90年代商品大潮冲击一切、精神贬值、人格异化背景下，中国诗坛趋于沉寂和严重分化——假诗人纷纷逃离诗坛而跳下“商海”，坚持下来的不多的诗人，面对无奈的现实，也普遍消磨了英雄气概和社会责任感而顾影自怜，只会咏叹个人的空虚寂寞和无聊的情绪，龟缩到个人可怜的小天地——在这样的背景下，惟独在那片古老神奇的长江三峡，随着三峡工程的上马，却悄然崛起了一个充满生机的诗人群体——“三峡诗群”，响起了他们不同凡响的歌唱。而80年代中期崛起的“新边塞诗群”，在一股西部“绿风”的吹拂下，这时已进而扩展为范围更广的“中国西部诗群”，在抒写其苍茫辽阔的“西部氛围”和“呼唤浩歌”的诗歌精神的基础上，又进而向表现生存状态和生命体验的层次深化，向探寻自然之谜和生命哲学的方向突进；艺术方法上也从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结合，进而融进了较多的现代主义艺术成分。这种植根民族土壤的地域诗歌群体的悄然崛起与发展，较之80年代中期“现代主义诗潮”浮躁、喧嚣的大轰大嗡，其诗歌精神与审美品位无疑要高出许多，艺术表现自然也成熟得多了。

无论是80年代中后期在“群魔乱舞”中卓然独立的“西部诗群”，还是90年代在商品大潮的浊浪中悄然崛起的“三峡诗群”，都有其不同流俗的黄钟大吕般的精神气度和特有的艺术风采。其所显示的地域性、民族性，时代性、人民性和面向世界的开放性，是同



其个人气度与各自独特的艺术风采紧密地融合在一起的,彼此之间是水乳交融、血肉相连、相辅相成的,惟其兼而有之,才算诗的上品。这正是我们需要张扬的诗歌精神和艺术品位。

但诗歌理论批评界对于地域诗歌群体的认识和重视,显然是十分不够的。他们在谈到 80 年代和 90 年代的诗歌创作的时候,往往连篇累牍地只谈到“归来之歌”“朦胧诗”“第三代诗”和 90 年代的“个人化写作”,而很少提到“新边塞诗”或者“西部诗”,更没有人注意到 90 年代悄然崛起的“三峡诗群”,在他们的观念中,甚至根本没有“地域诗歌群体”的地位,有的人甚至还把“地域诗歌”看做是一种狭隘的创作倾向的代名词而加以抹杀。这显然是没有也不愿去认真加以研究的结果。事实上,真正在诗歌史和文学史上成功的作品,既是地域的,也是民族的和独创的,然后才成为世界的,成为受到最广大读者热爱的血肉生动的作品——中国的古典名著《诗经》是这样,《楚辞》是这样,外国的诗人如莎士比亚(英)、彭斯(英)、雪莱(英)和普希金(俄)、叶塞宁(俄)、涅克拉索夫(俄)的作品也是这样。

鲁迅说过,“愈是民族的,便愈是世界的”。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而民族总是在特定的地域环境中生活的,因而我们也可以说:“愈是地域的,便愈是民族的”。哥伦比亚的马尔克斯,他的《百年孤独》里面那些充满魔幻现实主义色彩的故事和描写,谁能说不是非常地域性和民族性,而又十分独创性的作品呢?正因为这样,它才成为了享誉世界的名著,获得举世公认,并荣获了诺贝尔文学大奖。尽管咱们中国和生活在中国这片古老国土上的中华民族,是一个很大的概念,中国西部也好,长江三峡也好,只是伟大的中华民族生存、繁衍、从事劳动创造的部分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但那神奇壮丽、苍茫辽阔的河山,那古老悠久、辉煌灿烂的历史文化,那艰苦的环境、落后的经济和随着国家建设的西移而带来的发展机遇,尤其是西部那辽阔的地域、丰富的资源和西部人民特有的勤





劳、坚韧与开拓精神所拥有的无限潜力，所有这些，使中国西部在当今世界格局中具有了更加突出的“中国特色”——更能显示出我们整个中国和中华民族的历史状态与现实情景，更具有有一种显示“中国特色”的典型意义。

这样，“西部”就成了我们认识中国历史、文化（包括经济在内）和中国现实的一片蕴藏丰富的厚土！我们审视和研究从这片土地上生长起来的精神、文化和顽强生命，审视和研究“中国西部诗群”和“长江三峡诗群”的悄然崛起，及其诗歌精神、艺术风采与发展演变，自然就具有一种超乎狭隘“地域文学”的全民族审美创造的意义。

世界的读者，也将通过阅读“中国西部诗群”、“三峡诗群”的创作，而认识了解今天的中国。这种认识和了解，绝不是抽象的、理念化的，而是非常生动、深刻和感人的。与此同时，我们的诗人和作家，也该从阅读欣赏他们的诗作中，获得启发和鼓舞。

不仅如此，在进入“后工业社会”以后席卷全球的“文化回归思潮”中，“中国西部诗群”的崛起及其独特的审美精神，正和全世界、全人类“回归自然”的回归意识相呼应。中国西部虽然经济落后，充满艰辛，但却地域辽阔，资源丰富，人民特别勤劳坚韧和富于开拓精神，拥有无限的发展潜力。西部正是一片尚未被工业文明“污染”的洁净的土地，许多地方都还处于原生状态，人和自然相对独立、自由。如何处理好辽阔西部的开发、利用与自然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具有全球性战略意义的重大课题，必将引起全世界关注。

中国西部诗人生于斯，感于斯，他们的歌吟自然要引起全中国和全世界人类的注目。面对当今世界诸多矛盾及其对人类前景的严重威胁，“回归”意识正是对人类传统文化和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优质”的回溯与发掘，对大自然的规律的再认识、再探索与重新尊重，以求得人与大自然的关系的和谐，求得人类的健康发展。这种



深刻的思考,无疑将给予中国西部诗人以巨大的鞭策和鼓舞,并自然而然地反映到他们的创作中。这样,“中国西部诗群”和“三峡诗群”及其创作,就不仅仅是具有全民族的意义,而且具有了世界性的意义。这意义,是愈到将来,愈是远距离地回首观照,便愈是见得清楚。

因此,我们不仅需要把“中国西部诗群”、“三峡诗群”之不同凡响的歌吟,推向全中国,而且还要进一步推向全世界——让其在世界性的观照中,放射出更加耀目的光彩。

由此可见:诗歌的地域性、民族性和世界性,个人的独创性和人民性、时代性,彼此之间既是两两相对的概念,又是相辅相成的必备因素;只有兼而有之,才能产生诗的上品。这个道理,毋庸赘述,古今中外有不少成功的范例。

然而在我们的创作实践和诗歌批评实践中,却总有人要将其两个方面对立起来,相互排斥,强调或偏重一面,排斥以至抹煞其另一面,致使创作和批评的整体气象,总不能令人十分满意。这本小书,就想以 80 年代~90 年代中国社会和中国诗坛为背景,托出先后崛起的两个充满地域文化色彩、民族色彩与时代精神的地域诗歌群体,让大家在阅读鉴赏中,获得对这两个诗歌群体和对整个中国当代诗坛的更全面的认识,以至于获得对当代诗歌发展方向的某种启示。我只想将自己在阅读研究中欣慰之情,以及某种更高的希望,同大家做一次及时的交流——这种及时的交流,也许较之讨论已成为历史陈迹的文学现象,更有实际意义些。是为序。

作者 2002 年 10 月 29 日



引 论

世纪末,一个悄然崛起的三峡诗群

在 20 世纪末期冷落寂寞的诗坛上(一般读者对于新发表的诗歌已不感兴趣),在世界著名的“长江三峡工程”正紧张施工的三峡大峡谷,那块较少污染而略带原始性的地方,一个充满生气的三峡诗群却悄然升起,唱出了人们的心声,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感动和喜悦。在三峡那块拥有 6 万平方千米土地、1800 万人口的不小的地区,我们依然能看到人们爱诗、读诗、研究诗的热情,看到活跃的民间诗歌团体的活动及其所编诗歌刊物的长期发行,并且居然还成立了一所全国惟一的“中国新诗研究所”,年年都要招收中国新诗研究生,在金钱那么耀眼的年代,居然还有那么多莘莘学子,甘愿到那片清贫的诗的土地上辛勤耕耘。这在当代诗坛上是非同寻常的,就连我这个不太容易感动的人也被感动了,值得为它书上一笔。感到寂寞的诗人们!难道不可以从这里受到一些启发和鼓舞吗?那么,我这本书就算是送给你们的一份礼物吧。

1. 三峡诗群产生的文化背景

三峡诗群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出现,可以说是必然的。这首先源于他们对三峡这片河山及其历史、文化的独特感应和他们内心的焦灼与渴望。

长江自西向东横穿中华大地,形成西高东低的三级阶梯。在第二阶梯四川盆地的东缘,滔滔江流切割大巴山余脉和巫山山地,



形成雄奇险峻的长江三峡。这是一片古老神奇、壮丽多姿、有山有水、温润辽阔，既贫困、充满艰辛，又蕴藏丰富、拥有无限潜力的土地。这里的先民曾经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为中华民族的繁衍发展做出过自己的独特贡献。

考古学发现，早在 200 万～500 万年以前，就有人类的祖先“巫山猿人”在这里生息，从而打破了古人类学关于亚洲人是从非洲迁徙而来的说法。

这里流传着关于大禹劈山开河和神女瑶姬帮助大禹劈山治水的美妙传说，这人与神相沟通的故事，分明是三峡先民的意志、品质和英雄业绩的悲壮象征。数千年前，三峡先民就在这里生存、繁衍，先后创造了称得上灿烂的旧石器“长阳文化”，新石器“大溪文化”，部落氏族时期（即原始公社时期）的“巫裁文化”——“诸巫文化”中最丰富的部分。继后，3000 年前（大略商周之交）的先民巴人，便在这里创立了“巴国”，创造了与“中原文化”和“楚文化”齐名的“巴文化”。

随着楚、秦的西侵、南进，“巴文化”与“楚文化”和“中原文化”相碰撞融合，又开始了新的发展过程，而“巴文化”中的英武、坚韧却继续保留了下来，被发扬光大，吸取了“楚文化”的浪漫瑰丽和“中原文化”的博大精深、雍容华贵的丰富内涵，从而汇入了整个辉煌灿烂的中华民族文化的传统之中。

秦统一以后，直至汉、魏、六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这里的“巴楚文化”又与“蜀文化”、“中原文化”进一步融合起来，发展成为古代、现代、近代的更加丰富灿烂的“巴蜀文化”，成为璀璨的“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成为推动现代革命的重要策源地^①。

^① 例如，促成辛亥革命的四川保路运动，有朱德参与的 1926 年“9·5”万县反帝运动，刘伯承早年领导的反军阀起义等。



在滔滔长江以奔腾澎湃之势流过的这块土地上，至今还保留着上述古老文明的极其丰富的遗存，让后人景仰不已。至于埋藏地下的历史文物，就更多了，简直是可供考古发掘的巨大宝库！

而且这条汹涌巨大而深远的历史长河，它所卷过的还不只是一般的人类史，它还曾孕育、产生了中国诗歌艺术的辉煌篇章。屈原《橘颂》、《山鬼》以及包含在《九歌》、《九章》、《离骚》里对奇花异卉、悲壮山水、执著爱恋、不死精魂的深沉而悲愤的歌唱，其悲壮情怀与丰富的想象力都无不与这里的山魂水魄相关联。还有陈子昂、孟浩然、李白、杜甫、苏轼、陆游的吟唱，都已成为三峡古代文学的瑰丽篇章。一代诗圣杜甫在战乱与贫病中流寓三峡，一生中有1/4的诗篇是在这里写就的，篇篇都凝结着血与泪、真与美的光辉。中国古代另一些杰出的大诗人如白居易、刘禹锡、苏洵、苏轼、苏辙、黄庭坚、范成大……也都曾先后汇集在这同一块地方——三峡大河谷，发出各自的感兴与歌吟。这实在是文学史上的一种奇观。可以这样说：从屈原、宋玉的辞赋，到李白、杜甫、刘禹锡等诗人的三峡诗歌，再到古老的《三峡竹枝词》和《三峡船夫曲》，是开了三峡灿烂诗歌的先河。到了现代，三峡大河谷（包括川东宽谷）又孕育了何其芳、杨吉甫、沙鸥、方敬、绿蕾、罗泐、野谷、甘永柏、张永枚等著名诗人，他们的歌唱，又给中国现代诗歌增添了许多独异的色彩。而当代新诗人，更是层出不穷，各显风采。这充分显示了这6万平方千米的三峡地区——包括三峡大河谷、川东宽谷及其纵深地带，实在是文学艺术一片沃土。经济生活的贫困，自然环境的艰险，并没有束缚文学翅膀和想象力的飞腾！

三峡诗人生于斯，感于斯，无论自然山水还是历史文化的积淀，都不能不在他们的骨血与心灵中刻下深深的印记。他们是长江之子、三峡之子，是古老悠久的三峡历史文化及其所孕育的独特诗歌艺术的天然承接者。古往今来，那些由三峡壮丽的河山所滋养的诗人、作家，无疑为今天三峡文学和三峡诗群的崛起，提供了





丰厚的思想和艺术的养料,并给予他们启发、鼓舞和创造的力量。

在现代,20世纪30年代杨吉甫的“乡土田园小诗”,何其芳的早期诗歌《预言》集和散文《画梦录》、《还乡杂记》;40年代沙鸥的方言诗集《农村的歌》、《化雪夜》,绿蕾的大型组诗《长江大合唱》、长诗《写给故乡群山的兄弟们》和诗集《爱的煎熬》中的乡土诗;50年代沙鸥的诗集《故乡》、《红花》,梁上泉的一系列乡土诗集(《开花的国土》、《身在巴山蜀水间》、《大巴山月》、《长河日夜流》和诗选《山泉集》)以及张永枚的《还乡曲》(组诗)等,也都歌咏了三峡乡土,表现了浓厚的三峡乡土情怀,无疑是当代“三峡诗群”的先行者。杨吉甫的“田园小诗”,完全是三峡自然经济条件下的田园牧歌,是写给三峡村童的教育诗篇,非常优美动人,已引起国际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瑞典文学院院长、著名汉学家马悦然的高度重视,多次向中国人民提及,表示推崇。沙鸥的方言诗《农村的歌》、《化雪夜》(皆1945年出版)运用生动活泼的四川方言,叙写川东农村的悲惨故事,在40年代的中国诗坛曾产生相当的影响,引起了一场关于“诗歌大众化与方言诗创作问题”的热烈讨论。三峡诗人沙鸥、绿蕾、方敬不仅都参加了这场讨论,而且以积极的行动投身于更活泼生动的方言诗的创作,如沙鸥诗集《林桂清》、《红花》,绿蕾诗集《爱的煎熬》里的乡土诗,方敬的《背二哥》等诗作。绿蕾又以大型组诗《长江大合唱》、长诗《写给故乡群山的兄弟们》和诗集《爱的煎熬》(收入1946年~1948年的诗作),表达着三峡儿女对故国家乡的热爱和强烈的时代激情。新中国成立后,沙鸥、梁上泉、张永枚等又以新的语言抒写家乡新貌,其中也有不少清新可喜的纯朴佳作,张永枚的组诗《还乡曲》就是其中较有影响的代表作品。

“文革”浩劫结束后,沙鸥从北方回归故乡,在抒写充满历史反思意识的“归来之歌”和执著地进行诗艺探索的同时,又积极地扶持三峡青年诗人的成长,做了许多扎实具体的工作和贡献。长期蒙难而重获解放的老诗人罗泐,一面致力于“何其芳研究”,一面热



心扶持三峡青年诗人。方敬在扶持青年诗人,给予创作思想上的指导方面,也做了许多热情的工作。所有这些,都使他们成为当今“三峡诗群”得以涌现的当之无愧的前驱者。

2. 三峡诗群的集结

然而形成今天的“三峡诗群”的更直接的因素,还是新时期“改革开放”的发展及其对三峡人的巨大刺激、鞭策和鼓舞。

80年代以来,东部及沿海经济的快速发展,进一步拉大了东、西部之间的差距。三峡地区又经历大约十年间“不三不四”^①的尴尬处境的磨难,致使其贫困落后的面貌更加突出。这种情况极大地刺激了三峡诗人,他们不能不为此而发出焦急的呼喊!80年代晚期以后,长江三峡工程的上马以及随之开始的百万移民工程,又给予三峡人民以巨大的振奋、鞭策和鼓舞。三峡人民这种既深感受感焦急,又受到振奋的情绪,便首先从他们“最敏感的神经”——三峡诗人的歌唱中表现出来。

这批诗人一下子竟冒出那么多!这不是没有原因的,其最主要、最直接的原因,就是三峡地区贫困落后的形势和新的希望所给予的巨大刺激。柏铭久、冉晓光、杨辉隆、唐刚、南方、卢野夫、陈虹、徐培鸿、李尚朝、欧阳斌、杨亨荣、林涛、张守刚、余公、何佳(何莅佳)、刘文娅等中青年诗人,就是新涌现出来的三峡诗人的代表。他们大都是80年代后期开始放声歌唱的,通过“小雨诗社”、“太白岩诗社”、“白帝诗社”、“神女诗社”和“三峡诗社”等社团活动及其所办的诗报、诗刊,集结了他们的队伍,涌向诗坛,并在全国各种诗歌刊物、文学刊物与报章杂志上发表他们的作品。

^① 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三峡地区在行政归属上处于一种游移不定的状态中:一会儿筹建“三峡省”,要把它从四川省划出去;一会儿又取消“三峡省”的筹建,仍让三峡地区回到四川省,但一会儿又说要建立“重庆直辖市”,要把三峡地区划属重庆直辖市。于是三峡地区就长时间处于一种“不三(三峡省)不四(四川省)状态中”,大大影响了建设项目的投入,更加深了三峡地区经济的落后状况。

